甲午百年祭

吴廷嘉

There are many resons for China's defea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including both lack of technological preparation and miskakes in military strategy. But according to th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e defeat of the Qing army had even more complex social causes like the corruption of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army and government, outmoded thinking, and the weakening of military morale and popular resolve. In addi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miscalculated the extent of Japanese ambition and actual strength and adopted mistaken military strategies, blindly begging the big powers for support and thus tragically losing the war. The loss of this war greatly aroused every level of Chinese society, giv ing rise to modern thinging and the movemet of political reform.

一　甲午战败北的原因与教训

以中国惨败告终的甲午战争，过去了一百年。甲午败北的直接原因在军队溃逃，首当其冲的又推北洋海军的覆灭。它导致中方再无持久战之望，甚而再无还击之力。简单地归于为海军腐败无能武器装备落后，有悖于历史公允。中国海军当时在亚洲首屈一指，世界上也名列第六。大东沟一战，我方出动铁甲舰三：镇远、定远、济远，快舰四：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另有巡航舰六艘，水雷舰六艘。定远、镇远各重 7335 吨，装有 30.5 厘米口径巨炮。其余在 1000－2300 吨位之间。各战船也装有中口径主炮，足以穿透铁舰。日方出动十一艘战舰，巡洋舰五，海防舰三，铁甲一，炮舰一，旧式海防舰一，武装商船西京丸一。最重的吉野、松岛、严岛、桥立在 4200 吨以上，最小的赤城为 622 吨，其余在 2000 至 3700 吨位之间。舰队防卫能力中方优越，而攻击力日方则占上风。因为日舰系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下水产品，中舰则在 80 年代以前。日主力舰下水时间更晚，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技术性能遥遥领先，其主要标志是舰艇航速快，并大都备有速射炮，其中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三舰全部炮器都为速射炮，我方速射炮则极少。吉野的航速每时 22.5 海哩，“被称为世界无比”。①另有 19 海哩/时的四艘，16 海哩/时的三艘。而中国 18 海哩/时的仅有致远、靖远，其余则全在 15 海哩/时以下。潘向明博士说：“在定量意义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舰队”，可谓十分深刻。②这种技术上的差距在海战中导致了严重后果，但就整体而言，两军的实力相较悬殊并不太大。

北洋海军的素质，不仅为中国军队之冠，也普遍高于社会上其他阶层，这为中外有识之士、尤其是政治家和军事人物所共识。轻视他们这一特点及其作用的，恰恰是清廷的王公大臣，以

及那些昏聩的清军宿老们。北洋海军的各舰管带到大副、二副、轮机长一级上层军官，绝大多数系船政学堂、水师武备学堂毕业的科班生，相当一部分留学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堂，受过严格的正规教育与训练，此外，还有部分留法、留美学生。有许多人还是留学生中的高材生，如刘步蟾、林泰曾、叶祖圭、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等。而邓世昌、杨用霖则久经历练，善求新知。邓耿介忠肃，律己甚严，特行卓识，军中楷模，且嗜西学；而杨系文武双才，北洋海军中最能干将领之一。提督丁汝昌虽为行伍出身，不谙海战，但身先士卒，厚待部属，曾游欧访日，眼界广阔。海军士兵的士气、战术训练和意识、技能、尤其是炮术，都与陆军不能同日而语。在战斗中，济远炮手冒死坚持战斗，镇远少年兵士身负重伤运送弹药，定远炮手孤胆只身炸炮台，致远全体官兵250人同赴国难，义举壮举举不胜举，可歌可泣。曾任其副提督的英海军军官琅威理对他们评价极高："余予中国海军不胜其敬慕"，将佐"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而部队"倘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为逊……即与欧西大国较，亦尚绰乎有余。"③不少在该舰队服役的外籍军官，也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就连其对手日将伊东、坪井、东乡也不能不为之佩服，而在受降时以礼相待。甲午一役，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中许多人以身殉国，邓世昌、林升等捐躯于前，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等仰药于后。侥幸生还的叶祖圭、萨镇冰、程壁光等，则继续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北洋海军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弱点。技术装备方面的隐患在大东沟海战暴露无遗，船速迟缓，火器陈旧使之只能列横阵出行，使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组成的日舰突击队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大打快攻近战，并与主力舰队对我方形成了夹角之势，得战机之先。但技术上的差距只是重要原因而非成败关键，战术错误与指挥失措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将最弱舰艇布防于两侧，使队形成为半月形，各舰无法相互呼应，日军畏为虎豹的定远、镇远也难以显其威力；而旗舰号令不行致使各舰各自为战，兵力分散；这才构成大东沟一役主力受创的最主要原因。

即令此时的北洋舰队，也仍保有一定的战斗力。身中159发炮弹的定远舰与身中220发的镇远舰，依旧巍然屹立于海面上。除海战中击沉的致远四舰外，其余各舰也基本修复，鱼雷艇队完好无恙。遗憾的是，清廷当局令其蛰居基地不出的鸵鸟政策，使之屡失战机而坐以待毙。镇远触礁，定远中雷，最后均告自沉。士兵哗变，鱼雷艇队叛逃，援兵无望，尤其致命的是，旅顺港和威海卫炮台相继丢失，使北洋海军失去赖以支撑依恃的立足点和屏障，不得不就降。

如果说，海军败绩的后果较陆军为重，则陆军败绩的责任较海军为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军败于陆军之手。清廷寄厚望的湘淮各军，早已人才凋零，训练无方，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望风即溃。其余各军，也多系乌合之众。陆军素质极差，许多兵士连来福枪都不会使用，只能放二人合用的"抬枪"。叶志超部下的脚抹油会溜，卫汝贵所辖劫掠成性会抢，百性切齿痛恨；而千里驰援的大同府官兵，每人一条烟枪横挎腰间，以儒将自矜的淮军将领吴大澂军士，则每人一把折扇斜插肩上，见者莫不发笑。这种军队不打败仗，谁打败仗？能打仗的骁将本属凤毛麟角，更兼毫无接应，左宝贵战死平壤，徐庆璋固守辽阳，徐邦道孤掌难鸣，打了胜仗也成败仗。对于清军高级将领而言，战术意识和指挥艺术已几乎没有资格可以谈到。

军事上的失利潜藏着更加复杂的深层社会原因。腐败作风浸透了清末社会的整个肌肤，不仅陆军积习难改，就连海军也概莫能外。部分水师军官嫖娼聚赌，乃家常便饭。邓世昌痛恨这种恶习，反而不见容于众。军队的腐败，反映着执掌国家权力的官僚阶层的腐败。当时有句俗

谚："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丑态。李鸿章就带头中饱私囊，大小官吏尾随其后大敛民财，损公肥己。旅顺主将龚照玙不战自逃，掳掠财物无数，大连守将赵怀益则公然变卖军粮，变卖不了的军械枪炮物资，拱手相让全部资敌。冒领克扣军备物资和军饷的丑闻，可谓司空见惯，满耳皆然。光绪帝曾在上谕中为此大发雷霆，宣称要严加追究，到头来还是无法更改这种局面。这正因为政府的腐败源于体制的腐败，老大没落的封建帝国，百病缠身，病入膏肓。

甲午战争中，皇权专制与官僚政治的弊病，臻于极点。实柄朝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主和，战机一误再误。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庆其六十寿典，非常典型地展露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本质和嘴脸。官吏层层相袭，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贿索贿，在所难免。平壤的清朝将领所掠财物，竟有金砖 67 块、金锭 61 锭、金沙大小 30 包之多，其余贵重物品无数。[4]这种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孳生地，它又如何能禁绝腐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强弩之末的清王朝，其实力已不足维持传统的大一统局面，咸丰、同治以后崛起的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已见端倪。军队日益沦为洋务大臣们和地方官僚的私产，于甲午战争中得到了体现。中央号令不行，军队缺乏统一指挥，战争中屡见不鲜。加上封建政权中与生俱来的朋党派系之间的权力倾轧，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危险。李鸿章曾愤然声称，甲午战争可说是日本一国与中国北洋一系之战。当时更有人讥评，甲午战争乃日本一国与李鸿章一人之战。话虽失之偏颇夸大，但也透露出一些个中消息。联系到中国军队宁愿分散兵力各自挨打，也不愿同心同德相互接应，以及北洋水师四面楚歌、无人增援，而陆军把港口炮台拱手送敌的狼狈处境，不能不说这些话不无道理。这是政府及其体制腐败的又一恶果和深刻反映。

失去上升时期蓬勃活力的封建王朝，体制腐败的又一证据是其人才机制失灵失控。慈禧太后主和，战事委决于李鸿章。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产，只好任人唯亲，尽管他同时是个既爱国也爱才的悲剧人物。但在二者冲突时，他会由官僚政治的本性所驱使，选择前者。丁汝昌虽有气节，但不懂海这业务，也非帅才之选，而北洋海军中此类人才大有人在，邓世昌、刘步蟾、叶祖圭、杨用霖、萨镇冰等皆堪其选，而李鸿章却不能大胆擢用。他们同伊东、坪井、东乡等人在海军中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如严复与伊藤博文的不同际遇一样，令人深为扼腕。这种恶习也蔓延于下，北洋海军中粤闽之争由来已久，它涣散了舰队战斗力。刘步蟾作战勇敢，却忌刻排挤邓世昌，临战前夕还不顾大局，处心积虑要治罪于邓。这与日海军司令官西乡对浪速舰长东乡的曲意呵护，有天壤之别。陆军中更是所用非人，平壤统帅权交怯懦著称的叶志超，旅顺港交庸顽愚劣的龚照玙，东北防务给有勇无谋的宋庆，最可笑的，则是起用毫无实战经验与能力的吹牛大王吴大澂。

这样一个腐败的体制与政府，无力选择与决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而这才是甲午战争在全局上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公平地说，在清统治阶级中，长期占据主流派位置的顽固派和正统派，并非个个都是卖国贼和利禄之徒。相反，他们中一些人极富于爱国热忱和气节感。这尤以正统派中的清流派为突出。他们对列强环伺、国势日蹙忧心忡忡。但他们沉溺于天朝自大的迷梦，沾沾自喜于同治中兴的虚假繁荣，不可能提出近代化的要求并为之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他们对世界大势了解甚少，甚而是愚昧无知，他们可以为同文馆的设置争议不休，害怕"以夷变夏"而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而对中国的实业开发、军队建设漠不关心，除了多方阻挠以外，说不出个子丑寅

卵。他们头脑停滞于盾牌大刀所向披靡时代，认日本为蕞尔岛夷，完全不放眼里。以光绪帝和其傅相翁同和为代表的主战派，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这种狭隘的思路与虚骄之气，对日本缺少战略分析与认识，仓促应战，各方面的准备都严重不足。清统治阶级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与施政大纲，不敢也不能对封建政权及其体制开刀。他们学皮毛之学，行皮毛之变，虽然也有不少成果，如建北洋海军、同文馆及各类船政、武备学堂，开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等等，但终究动不了全局。诚如李鸿章所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一旦揭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⑤这种对洋务运动结果和实力没有把握、又害怕揭破的认识与心理，决定了李鸿章贯穿始终的主和态度。战前他对日本屡送秋波，日本并吞琉球他放任不管，处理朝鲜事务他却要通知与其无涉的日本，以示尊重，从而纵容助长了日本侵略中朝的野心。战争中他拒不给予北洋海军自主权和主动出击权，致使其被挨打，丧失了制海权。对陆军的布防和指挥也是穷于应付，畏葸塞责了事。和谈时一让再让，以致千夫所指，万人诟骂。有学者认为李重于防俄疏于防日，这未免有点冤枉。李十分警惕沙俄对东北的觊觎，对日本必将争雄亚洲，并与中国一较短长，更加了若指掌。但他对日本野心与实力的膨胀，同样估计不足；又迷信"以夷制夷"，指望英、德、俄、法等国牵制日本；这两者都加剧了他在对日求和问题上的战略错误。

这种战略方针的大错，造成对海军建设、特别是购舰措施上的掉以轻心。购舰经费长期无着，直接恶果就是北洋舰队技术装备和作战能力逊于日方。及至开战以后，急需增添七艘舰只，这笔巨款从何筹措？这种战略错误也导致甲午战争中后勤不力并屡屡失误。定远、镇远 30.5 厘米口径巨炮威力不凡，镇远一弹命中松岛就使该舰死伤 100 余人，日方不得不改换旗舰，伊东等人俱为胆寒，而巨炮炮弹在大东沟一役中仅有三发。陆军枪支弹药奇缺，饷银短绌，将士因之逃亡哗变屡有发生。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有关电文中，此类狼狈情景绘形绘色，万分火急。在文廷式的《闻尘偶记》中，记述了神机营出兵队列中，竟有"十一二龄的童子"。兵士"多衣裤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⑥另一方面，则是旅顺、威海卫的克虏伯、阿姆斯特朗等世界上最新式大炮，和其它堆积如山的精良军械，"有器无人终委敌。"⑦

战略决策错误，还源于陈腐的传统观念。清廷满朝权贵，对制海权的重要性茫无所知。海军经费历年来入不敷出，海军总署年收入最高时不超过 300 万两，且终常被挪为它用。北洋舰队的三铁甲、四快船虽系专款添置，但自 1887 年后，北洋海军除平远舰以外，就未再购置过新式战船。对海军将士，大吏们也每每侮谩歧视，文官尤然。他们"藐视海军将弁，以为纠纠武夫，何足与论大事？"⑧纵使亲手创建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也时而难逃这种偏见的束缚。在丁汝昌、戴宗骞争议威海炮台指挥权与节制权时，李偏戴抑丁，其后戴坚拒海军炸毁炮台之请，致使炮台沦于敌手之后，成为北洋舰队的最大威胁。日本则不然，他们高度重视海军近代化建设，当作举国公认的战略目标，处处优先。战前李鸿章奏请，以逐年合拨办法凑足 60 万两经费，添置各舰快炮，而连定远、镇远的快炮都未能运到时，战火已燃至眉睫。"至日本之各新式巡洋舰，概皆购自开战之前，在我停购海军船舰之日，即为其海军极力猛进之时。以舰龄论之，较我殆少十年。船械俱新，尤以速射炮为其最有力之武器。"显然，日本以海军建设为战略重点，对中日战争作了缜密的准备。与镇远、定远"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仅配大炮三尊……经远、来远……尚缺尾炮炮位。"的现状相比，岂能相提并论。⑨而且，日本本着这种新的认识与方针，贯彻知己知彼原则，对北洋海军状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和作战布置，我方则仓促上阵，对日本海军

不甚了了。

陈腐的传统观念也影响了指挥艺术与技战术的制定和发挥。中方不谐海陆军的协同作战，就连陆军之间的相互配合也很差。李鸿章抱怨兵单将少，德人汉讷根指斥中国军队无统帅、无名将，其实中国并非无人，而是有人也不能用、不会用。牙山护航、方伯谦挂白旗逃归固然有玷国格，但他于激战之后，在敌众我寡情况下撤离现场，保存济远实力的做法，却未可厚非。这也是西方军队作战的通用原则。而方伯谦长期接受的恰恰是这种军事教育。而不经调查确证和审讯，就将其匆忙正法，说明中国政府和军事当局，法制观念之薄弱，并再次反映了唯君命是听的封建专制淫威。这使方成为至今诉讼不已的公案。不论他究竟该当何罪，更重要的是，缺少法制，就无法建立一支真正称得上近代化的军队。战争中，军队管理松弛，纪律败坏，将领谎报军情，贪功领赏，译署乱改电文，报喜不报忧，上下相隔，赏罚不明，甚而是非颠倒，也莫不与此有关。

两种观念的冲突，也是促成刘步蟾等人相继自杀的重要原因，这其实给北洋海军、尤其是其后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然，邓世昌、林永升等人打出军威国威，壮烈牺牲，则又当别论，自当永远彪柄史册。至于中国军队，随日军一起，围歼高升号泅水士兵，则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有悖于近代战争的人权意识和人道精神，表现了浓厚的封建痼习。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陈腐的封建观念，并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凝聚力。全国人心涣散，对清政府失望达于顶点。“太息群才皆竖子，何曾一个是男儿。”“功狗功人谁努力，眼中孤兔尚纵横。”真是“误国群奸全是贼”，“可怜浩劫满乾韩。”⑩士兵无斗志，军队如“满地散钱”。就连朝廷的中枢要人，封疆大吏，也深感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失去对政府的起码信任与信心。李鸿章的心腹干吏周馥，就指出甲午战争使“中堂一生勋业从此堕矣！”甲午之败是“中国自失之。”⑪“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这种“病急始求医”，“老马空皮骨”的状况，使他难以相信还有什么“澄清会见中兴日”，只好哀叹自己和一邦老朽“筋骨已衰残”。⑫

对比之下，日本朝野上下，同仇敌忾，足令中国难堪。尽管日本对内盘剥，对外掠夺，虎狼成性，但明治维新后种种发皇气象，给日本民族和国家，带来了生机与希望。从这个角度上看，中日双方的较量，也是两种体制的较量，是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及其不同社会后果的较量。孰优孰劣，明眼人一望即知。两国实力的确相距不远，日本的经济起飞在甲午之后，而且主要依仗马关条约所攫取的巨额赔款，为之获得了原始积累所需的启动资金，以及从朝鲜和我国台湾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中朝人民为日本的经济开发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这是日本历层政府无可回避的铁的历史事实。也是今日本当局所不应忘记和必须正视的血的教训。但从中国方面而言，则须看到日本经过资产阶级改革，成功地实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初步走上近化代道路后，在中日战争中终于崛起于东亚的重要启示。中国在甲午战争之所以惨败，归根结底，是体制腐败而又不从根本上去谋取变革的必然结果。而这正是中国落后于世界、落后于日本的症结所在。

国际背景和外交方针的失误，也是中国败北的重要原因。中国为朝鲜宗主国，应其政府之请出兵该国，符合国际惯例。日本借机开衅并不宣而战，实属强盗的侵略行为。但中国支持封建残暴的朝鲜政府，阻挠朝鲜改革运动，镇压其群众的抗暴斗争，充当东亚宪兵角色，又使日本打着支持朝鲜自主和改革的旗号，欺骗朝鲜政界和民众，以实现和推行其殖民统治，找到了时机和借口。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新格局。“中国不自振，并欲属国不自振，且愿与国皆不自振，诚何说哉！是皆狃于国初羁縻外藩

之见也。”⑬与此相反，对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清王朝又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指靠由它们出面来掣肘甚而制裁日本。不求自身的自主、自立和自强，仰仗他国鼻息，自然只能是一枕黄粱。与清廷的愿望相反，列强亟待扶植日本，以在中国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并以日本作为平衡彼此利益冲突，并遏制沙俄对华扩张的重要砝码。故而在战争期间，列强政府实际上支持日军。英国尤其明显，连对日舰无端击沉其商船高升号，也只是装模作样地开了几次听证会后，就不了了之搁置一边。李鸿章饮鸩止渴，转而亲俄，在外交钢丝索上继续进行种种危险动作。

二　维新运动的勃兴与近代化的开端

甲午战争招致了社会各阶层对洋务运动的全面检讨。先进知识分子严复等人拍案而起，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洋务派的智囊人物郑观应、马建忠、陈炽、宋恕、何礼恒等也纷纷揭露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普通市民怨声载道，舆论界一片哗然。这些情况笔者在《戊戌思潮纵横论》一书中已作过简要的介绍与剖析，此处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就连洋务大员们对此也有反省。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 30 余年、参予筹建北洋海军、开办海军学校、唐胥铁路、开平煤矿，设立天津机器局、电报局的周馥，就一针见血地总结道：“今者，朝廷奋兴，讲求新政，而人心犹是当日之人心，体制犹是当日之体制，窃恐徒袭皮毛而无一实济也。虽练海陆如英、德，扩疆土若俄，精机器如美，我恐其适以资敌而不能一朝守也。有心者曷探其本而速图之！”⑭体制改革与观念更新，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维新思潮和变法运动应运而生。

政治上，十八省举人联名的“公车上书”，震撼朝野。它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终于集结一起，提出了以和平手段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和施政大纲，这成为中国亘古未有的大事与大变动。

甲午败北使光绪与慈禧、翁同和与李鸿章，共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讥讽与嘲笑。皇权专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甲午筹款，开捐举人百名，以二万金一名，朝廷之贪婪鄙下略见一斑，国人之趋官若鹜也丑态毕具。然而，到丙申(1896)年，“应命捐纳仅二人”。⑮嗜官如命的中国人，对官的向心力大打了折扣，对皇权的忠诚程度，自然也大可怀疑。的确，中国封建社会“全盛之时”，皇帝“有若神祇”。清王朝承继发展了这一制度，“十八省之官民士庶，悉北面而称臣；今苟不能挞伐日本一小国……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⑯就连光绪本人，也从祖宗之法不保祖宗之地的严酷现实中清醒过来，鼓足勇气冒犯慈禧天威，声称不能变法图强，宁可不当亡国皇帝。帝后之间的权力之争增加了深刻的政治内涵。以翁同和为首的部分正统派，在甲午之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前，由爱国出发，接受了变法思想，转而同情并支持维新志士，同顽固派分道扬镳，划清了界限，成为帝党的中坚。

社会变革呼唤新型人才出现。甲午战争暴露的“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全国慨然，对清统治阶级部分上层人物也深有触动。“国之弱，视人才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今日者，创钜矣，痛深矣……艰难困苦之时，正圣主激励奋兴之日……天上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然。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习，无以作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⑰历任新疆巡抚、陕甘与两广总督的陶模于 1895 年上折著名的《培养人才疏》。同年，顺天府尹、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胡燏棻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开民厂、振工商、兴学校、重整海军，力行西法，向日本学习。“务必破除成见”，“求经济匡世之才”。⑱维新志士有了自己的政治后台。1898 年，经翁同和密荐，康有为得以受到光绪帝接见与赏识，打

开了通往最高政治权力的道路。维新思潮与变法运动在中国政坛上取得了合法地位，形成第一个高潮。中国近代化运动由此全面发端。“祸兮福之所倚”，甲午战争失败引发的种种社会危机，成为中国改革的契机与起点，真是历史辨证法的胜利。

经济上，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列强通过各种政治借款，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盐税、内地税等全部财政收入，左右了中国政局。列强对华金融投资事业迅速发展，著名的世界性大银行汇丰、花旗、道胜、法兰西等均开展了对华业务，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也于战后建立起来。列强对华工业投资急剧增加，1913 年以前外国在华较大规模企业 166 家，多于甲午后开办。商品输出继续发展，1894 至 1913 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加 2 倍半，外商增加 3200 家。⑲通用电器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等世界托辣斯组织于 20 世纪初，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综上所述，中国已直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生产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商品和原料基地了。小农经济受到了强大冲击，农村解体过程加速。而外资的投入和刺激，社会化生产的优越性及其新式企业的高额利润，开放口岸新兴城镇的涌现，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1894 年至 1902 年间，民族资本迅速增加，且以工业为大头。九年间投资总额为 3700 多万元，新开厂矿 110 个，而 1872 年至 1893 年 22 年间的投资总额仅 1700 多万元，厂矿总数仅 66 个。⑳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尝试“下海”的滋味，连状元孙家鼐、张謇、陆润庠和作家曾朴等都不例外，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康广仁等人也开始办书局和公司。此外，荣德生、荣宗敬也于 1901 年起投资办厂，其后发展成著名的荣氏产业。

文化方面的突破尤为惊人。甲午以后，学习西学蔚为热潮，新书、新学、新知识源源不绝涌进中国。新式学堂和新式报刊，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从而出现了一批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一批“专职”的知识分子人物。他们挑起了创立近代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和学术研究、科学发明的大梁。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步发生着重大变革，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还有君主立宪与议会制度、民权意识乃至共和政治，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之中。甚而政党政治，也在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和保皇会活动里，见到了最早的萌芽。这些情况，也在《戊戌思潮纵横论》一书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证。

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华民族的先进人物，他们看到了中日在体制和体制改革上的差距，并从中领悟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封建文明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时空落差。他们发起了维新思潮与变法运动，以挽求民族的危亡，实现祖国的富强，从而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不过，这种启动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复杂的、内在的矛盾冲突。西方文明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中国大门，双方是在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均等、文化不对等的背景下进行交流。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又是通过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战争的胜利来体现，这对中国的民族自尊和正当权益，是极大的伤害。在这种屈辱的历史背景和悲惨处境下，承认并正视现实，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识。理智和感情的冲突，在中国近代化里程中，比别的任何国家都显得更为敏感和尖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发掘和升华，成为新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和要素，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真正的百年震荡。中国人至今仍在甲午以来所开拓的近代化（也即目前的现代化）道路上，艰苦地探索、徘徊和奋争。

长期以来，史学界未能严格地区分我国近代史与近代化开端的区别，其实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不同于欧美的又一标志和导因，在后者那里，二者是统一的、

同步的。而中国的近代化却滞后于近代史。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但鸦片战争未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轨道，这是甲午战争后的事情。发生这种误解，就在于我们不清楚或者忘记了，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数，而不能只看政治、经济或其它单一的社会要素而定。鸦片战争仅仅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成为这种社会性质的国家，却在甲午战争之后，而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近代化，也于那时才高扬起来。忽视甲午战争的社会内容和历史主题，也就难以抓住这条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线索，难以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困难、经验和教训。由前苏联的部分史学家在其大百科全书有关条目中，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八大运动、三大高潮的理论模式，并统治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界数十年之久。这一模式客观上把近代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史一门之内。它以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暴力斗争为主线，概括近代史主要内容。这既不全面，也不符合事实，且将中国近代史分割成几个缺乏内在联系的政治运动，无法描述和总结整个近代史发展的全貌。这一理论模式的误区之一，就在于它没有认识到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化的启动点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转折点。

---

①中国史学会：《中国战争》(一)，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下同)，第 215 页。
②潘向明：《甲午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研究—— 关于清朝所以失败的原因》，第 51 页。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论文，1992 年 10 月 15 日。
③《中日战争》〈七〉，第 518、517 页。
④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54 页。
⑤《中日战争》〈五〉，第 600 页。
⑥《中日战争》〈五〉，第 496 页。
⑦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 1958 年版(下同)，第 2 页。
⑧、⑯《中日战争》〈七〉，第 518 页、第 520 页。
⑨《中日战争》〈六〉，第 72 页。
⑩《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 12、97、98 页。
⑪《中日战争》〈五〉，第 210、212 页。
⑫《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 46、47 页。
⑬⑭、⑮《中日战争》、〈五〉，第 211 页、第 495 页。
⑰⑱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269、289 页。
⑲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0 页。
⑳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93 页表①有关资料推算，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